

般若無盡藏真言

納謨薄伽伐帝。鉢利若。波羅蜜。多
曳。怛姪他。唵。訖利地。唎。室唎。戌魯
知。三蜜栗知。佛社曳莎訶。

金剛心陀羅尼

唵。烏倫。泥。娑。婆。訶。

補闕真言

南。謨。喝。囉。怛。那。多。羅。夜。耶。佉。羅。佉。

長江中游

胡彬彬 龙敏 著

CHANGJIANG ZHONGYOU

XIEJINGBAOLUAN

湖南大學出版社



写经宝卷

写经宝卷

長江中游

胡彬彬 龙敏 著

CHANGJIANG ZHONGYOU
XIEJINGBAOJUAN

湖南大学出版社

般若無盡藏真言

納謨薄伽伐帝。鉢利若。波羅蜜多。
曳怛姪他。唵。訶利地唎。室唎。戌魯
知。三蜜衆知。佛社曳莎訶。

金剛心陀羅尼

唵烏倫泥娑婆訶

補闕真言

南謨喝囉怛那。多羅夜耶。佉羅佉。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收录长江中游地区(以湖南、湖北、江西为主)的写经80件,连同细部特写,共计为140幅图片。这些资料都是作者二十多年的田野考察所得,属于首次公开出版的新资料。全书由概论和图版与说明组成。概论系作者从新资料出发,结合我国古代宗教、文化制度和乡规民俗进行的学术研究成果,也是引导读者阅读本书的钥匙。每个图版的介绍都包括基本信息和解说文字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长江中游写经宝卷 / 胡彬彬, 龙敏著. — 长沙: 湖南大学出版社, 2011.8

ISBN 978-7-5667-0058-2

I. ①长... II. ①胡... ②龙... III. ①长江流域-文化史-文集

IV. ①K295—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72829号

长江中游写经宝卷

Changjiang Zhongyou Xiejing Baojuan

作 者: 胡彬彬 龙敏 著

责任编辑: 李 由

责任校对: 祝世英

责任印制: 陈 燕

出版发行: 湖南大学出版社

社 址: 湖南·长沙·岳麓山 邮 编: 410082

电 话: 0731-88822559(发行部), 88649149(编辑室), 88821006(出版部)

传 真: 0731-88649312(发行部), 88822264(总编室)

电子邮箱: liyou0731@126.com

网 址: <http://press.hnu.cn>

印 装: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×1194 16开 印张: 8.5

字数: 184千

版 次: 2011年8月第1版 印次: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~2 000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5667-0058-2/K·54

定 价: 90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
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, 请与发行部联系

概论





为一体，出现了民间化、民俗化、地域化的特色。唐以后长江流域的写经宝卷，散存于广大乡野农家或小寺小庙之中，难以系统收集整理，也缺少相应的学术关注。敦煌文书的研究固然应当继续，但唐以后的写经宝卷的收集、整理与研究，同样应该予以重视。

佛道二教，自汉代以来，经过历代教徒的努力，积累了大量的文献。随着时代的发展进程，大部分重要文献被收集整理，逐渐汇编成为佛道二藏。在古代木版印刷技法盛行之前，佛道二经主要依靠手工抄写而广为流传，这一现象，催生了以专门抄写经书为职业的「经生」的出现，发展到后来，甚至出现了被后世称为「写经体」的、专门化的字体特色和书写规范。写经受到上层人士的重视，是主流文化意志的反映。在印刷术盛行之后，手工抄写仍然是相当普遍的。自敦煌藏经洞于百余年前发现大量写经文书以来，有关佛道写经的研究，便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，在全球，甚至兴起了专门的「敦煌学」。中国文人和学术界，往往有着厚古薄今的习惯，他们对这些古老的敦煌写经异常重视，进行了细致的研究。许多书写精好的写经，被当作书法字帖影印出版。唐末五代以来，随着印刷术的兴盛，手工书写的热情不免稍减。抄经逐渐与政权文士、寺观僧道之间拉开了明显的距离，而与信众的日常生活渐渐融

「写经宝卷」，大致由两部分构成。一是抄写佛道二经，二是宝卷。在中国古代，佛道二教关于宗教优劣或地位高下的问题常常争论不休，但二者又往往有着相互渗透，彼此影响的痕迹。随着佛教的不断中国化，佛经中常常杂糅着中国传统思想的成分，甚至干脆把中国传统的某些思想，以「如是我闻」的形式，假托佛陀所说撰写成著。「写经」有「真经」和「伪经」之分。「真经」固然是有根有据的译文，是引进印度的佛教思想，是中国佛教赖以存在的根基，而「伪经」却是佛教逐渐中国化的绝好材料。尽管「伪经」或为传抄者有意增损而成，但它在反映中国人如何接受佛教、如何改造佛教、如何把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或地方宗教观念结合起来等方面，确实有着超过真经的价值。

「宝卷」，一般认为是从唐代变文发展而来的通俗文学，以劝世经文与佛教故事为主，采用通俗的语文、说唱形式，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、惩恶扬善等思想。是民间宗教宣法传教的主要形式，受到区域性和民间性佛教流派以及广大民间信众的欢迎（在上层僧侣和知识分子当中，受到广泛欢迎的仍是禅宗和净土宗）。

一

佛家有三宝之说，其中的佛法，主要是以佛经的形式出现的，因而，佛经，事实上与佛法等同起来，被予以非常尊崇的地位。传抄佛经，也因此被视为重要的功德，是佛法的具体化。

《道行般若经》卷二云：「欲取佛者，当学般若波罗蜜。当持当诵，正使不学不持不诵。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但书写持经卷，自归作礼，承事供养，名华捣香、泽香、杂香、缯彩、华盖、幡幡。」《般舟三昧经》云：「复有四事，疾得是三昧，一者作佛形（象），用成是三昧故。二者持好素写是三昧。三者教自贡高人内佛道中。四者常护佛法。」又《法华经》卷四云：「若复有人，受持、读诵、解说、书写《妙法华经》乃至一偈，于此经卷敬视如佛，种种供养华香、瓔珞、末香、涂香、烧香、缯盖、幢幡、衣服、伎乐，乃至合掌恭敬，药王当知，是诸人等，已曾供养十万亿佛，于诸佛所成就大愿。愍众生故，生此人间。」

前两种佛经，《道行般若经》、《般舟三昧经》，是东汉灵帝光和二年支娄迦谶所译，根据经文内容可以推测，在公元二世纪之前，古印度已经有写经。当时，有域外僧人携带佛经来到中国，《出三藏记集》卷二称，后汉桓帝时，竺佛朔赍梵本至中夏。然而，毕竟当时的印度佛教经义是以口头传诵为主，抄写

佛典的风气并不兴盛。即使是晚至东晋，法显前往印度求取佛典，也感叹说：「北天竺诸国，皆师师口传，无本可写。是以远涉乃至中天竺，于此摩诃衍僧伽蓝得一部律。」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四，谈到佛陀耶舍「诵大小乘经二百余万言」，后来他在中国西域「诵罢无德律，姚兴疑其遗谬，乃试耶舍令诵民籍药方各四十余纸，三日乃执文覆之，不误一字」，表明古印度背诵佛典风气的流行。

因而，我们更愿意相信，传抄佛典的风气是在中国得到大发展的。当然，这也与《法华经》等大乘佛典，对传写佛经功德的竭力鼓吹有关。《法华文句》卷八认为，「书写法师」是五种法师中功德最殊胜者。《放光般若经》、《首楞严经》、《贤劫经》、《不退转法轮经》、《方广大庄严经》、《大方等大集经》、《金光明经》等诸大乘经典，都提倡书写佛典的功德，然早期的阿含及诸律等，却没有提及这方面的内容。传世的早期写经，往往在卷末题记中，明确表明写经的目的，如写本《金刚经》「斯二六〇五号」，「大隋大业十二年（六一六年）七月二十三日，清信优婆夷刘圆净敬写此经，以兹微善，愿为一切众生转读，闻者敬信，皆悟苦空；见者受持，俱胜常乐。又愿刘身早离边荒，速还京辇。罪障消除，福庆臻集。」文字内容与金石造像记略同，这表明，在信众心目中，写经与造像的功德，其实





是相差无几的。

中国在东汉时期开始翻译佛经，与此同时也开启了书写佛典的历史。根据当时的译经程序，由胡僧或梵僧与中国人合作，由笔受者等书写，经过反复润色，最终定稿。例如，《出三藏记集》卷七所载《慧印三昧及济方等学经序赞》言，云法护译出济方等学经之后，竺法首笔受，写以流通；同书卷八所载《正法华经后记》云，西晋·永熙元年，比丘康那律于洛阳写《正法华经》；同书卷十一所载《略成实记》，云《成实论》是昙晷笔受，昙影正写等，皆其例也。翻译的佛典定稿之后，用书写的方式反复抄写，从而传布四方。

现今所知抄写年代最早的佛经，是抄写于曹魏甘露元年（265）的《譬喻经》一卷（日本东京中村不折氏藏），出土于敦煌。卷后题记云：『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□□中写讫。此月上旬，汉人及杂类被诛。向二百人愿蒙解脱生敬信三宝，无有退转。惟大圣之难遭，至教实叵值，之不愚惻，来世何异异感觉弘慈，察彻知所忌一校□□□□□定写讫，因记作数言，毕思其旨。』当时的西域是佛教流通极重要的地区，似可看做是中印佛教交流的中转站。中国第一个僧人朱士行出家于公元二六〇年，他就是前往西域搜求经典的。《出三藏记集》说他『以魏甘露五年（二六九年）至于阆国，写得《放光般若经》之

梵书胡本九十章，六十万余言』。

年代稍后的纪年明确的著名写经遗存，据《望月佛教大辞典》『写经』条目的统计，有《宝梁经》卷上一卷（晋惠帝永熙二年四月写，敦煌出土，大谷大学图书馆藏）、《诸佛要集经》（首缺，卷下残片，晋惠帝元康二年正月写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谷沟出土，西本愿寺藏）、《大般涅槃经》卷三十（首缺，晋惠帝永兴二年二月写，敦煌出土，大谷大学图书馆藏）、《十诵比丘戒本》（西凉建初元年写，敦煌出土，大英博物馆藏）、《法华经》（方便品）（首缺，西凉·建初七年写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附近出土，二乐庄藏）、《法华经》（方便品）（首缺，北凉·承玄二年六月写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鄯善出土，中村不折氏藏）、《佛说菩萨藏经》卷一（沮渠安周承平十五年写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出土，同上藏）、《佛说观音普贤经》（首缺，南齐武帝永明元年正月写，同上藏）、《唯摩义记》（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二月写，敦煌出土，大英博物馆藏）、《胜鬘义记》（北魏宣武帝正始元年二月写，敦煌出土，同上藏）、《大般涅槃经》卷十一（梁天监五年写，敦煌出土，同上藏）、《法华义记》（失题，同正始五年五月写，同上藏）、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卷十五（梁武帝天监十一年写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出土，中村不折氏藏）、《成实论》卷十四（北魏延昌元年，敦煌出土，大英博物馆藏）、《菩萨

处胎经五帖》（西魏大统十六年写，京都知恩院藏）等。

二

自汉晋以来，至南北朝时期，佛经抄写的风气盛极一时。在南朝，刘宋武帝自写《戒经》，齐高帝尝写《法华经》，竟陵文宣王尝手书大字《维摩经》等共计十七部七十一卷，其子巴陵王亦写《法华经》等十部二十卷，明帝亦尝勒写一切经。根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载，梁武帝在华林园中总集释氏经典共五千四百卷，沙门宝唱撰经目录，据称这是佛经有藏的开始。梁简文帝又血书《般若经》十部，刘慧斐手写佛经二千余部，陈武帝、文帝、宣帝又各曾勒写一切经十二藏、五十藏、十二藏，徐陵、江总等名士亦曾写一切经。

北朝魏道武帝传写一切经，司徒北海王详及司牧高阳王雍亦写一切经十二藏，安丰王延明及中山王熙以香汁和墨写《华严经》一百部，又造金字《华严经》一部，太卿大司马洛州刺史冯熙（文承太后之父）写一切经十六部。北齐孝昭帝为先皇写一切经十二藏，合三万八千四十七卷。慧思书金字《般若经》及《法华经》各一部，自造愿文，誓传之弥勒之世，魏收又制三部一切经愿文。北周武帝又诏写经一千七百部，孝宣帝书《般若经》三千卷，莫陈休写一切经，王褒撰周经藏愿文。

至隋代，文帝尝勒写四十六藏十三万二千零八十六卷，又修治旧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；炀帝亦曾修治旧经并新写一切经。又依《法苑珠林》卷十八记鄆州宝室寺沙门法藏，于大业五年在洛交县韦川城之寺写一切经八百卷，寻以好手纸笔，更于京城旧月爱寺书写其余。现今日本奈良圣语藏所藏隋代书者，系《贤劫经》、《大智度论》等六部书。帝王如此，当时民间僧俗的写经风气之兴盛，亦可想而知。

唐代，佛教界亦承此写经之风。隋唐为中国佛教之全盛期，同时，也是写经的最盛期。贞观五年（六三一），太祖于苑内德业寺及宣兴寺书写藏经；九年四月，勒大总持寺僧智通、秘书郎褚遂良等于苑内写一切经；十一年四月，皇太子又于延兴寺造一切经；高宗于龙朔三年（六六三）正月于大敬爱寺写一切经，至麟德元年（六六四）正月，由惠概、明玉、神察、道英、昙邃等，参覆量校，三年，遂写旧经论七百四十一部，二千七百三十一卷，并玄奘新译经论七十五部，一千三百三十五卷，新旧共合八百一十六部、四千零六十六卷入藏焉。又，当时僧众写经之风亦盛，如善导尝写《阿弥陀经》十万余卷，现存新疆出土之《阿弥陀经》之残经有「愿往生比丘善导写弥陀（缺约十字）者，罪业消除，福命长远」云云之后记。又知恩院所藏《大楼炭经》卷三之奥书有跋云：「咸亨四年章武郡公苏庆节，为父邢国公敬造一切经。」后，开元二





年正月，与淘汰僧尼伪滥之同时，并禁止民间铸佛及写经，然其书经之事，尚见继续。特别是唐代以后金银泥经之屡见书写。圆仁之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云，普贤道场之经藏阁，有绀纸金银字，白檀玉牙之大藏经六千余卷，是大历十四年长安郑道觉所写。

以上是《望月佛教大辞典》^①、《中华佛教百科全书》^②等著述，对南北朝隋唐写经基本概况的简要回顾。在此择其要义转而引述，使大家对这一时期写经刻经藏经的情况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了解。

三

古老的抄本佛经，现存的写本佛典，绝大部分出土于敦煌藏经洞。这些写经遗品，分别被收藏于英国、法国、日本，也有相当一部分保存在中国。写本的年代，上起三国曹魏，下到隋唐，且以隋唐时期的写本居多。这些抄本经典中，有些是后来失传的佚籍，幸赖抄本得以重新流传，为我们了解当时的佛教状况提供了依据。

有许多抄本，是当时的职业书手抄写的。『投笔从戎』是关子班超『尝为官佣书以供养』的一个故事，表明手书是久已有之的一个职业，在佛教兴盛的年代里，抄写佛经成了书手的一项重要工作。有些书手的书写水平很高，甚至不让于当时的著名书法

家。启功曾经说，『唐人楷书高手写本，莫不结体精严、点画飞动、有血有肉、转侧照人。校以著名唐碑，虞、欧、褚、薛，乃至王知敬、敬客诸名家，并无逊色，所不及者官耳。官位越高，则书名逾大，又不止书学一艺为然也。余尝以写经精品中字摄影放大，与唐碑比观，笔毫转使、墨痕浓淡，一一可按。碑经刻拓，锋颖无存。即或宋拓善本，点画一色皆白，亦无从见其浓淡处，此事理之彰彰易晓者』。其实，南北朝写经的书写技艺，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。北朝文字书法，流传至今的绝大部分是刻石，如著名的『龙门二十品』，而手写真迹非常稀少，幸好有写

^①《望月佛教大辞典》，由世界圣典刊竹协会于一九七四年出版，先后由望月信亨、冢本善隆主编。十六开本，凡十册。第一册至第七册为望月信亨主编，历时三十年，完成于一九三六年。八至十册为补遗，完成于一九三六年。其中所收佛教教义、人物、名相、历史等条目，广引经典原文，相加解释。此辞典在综合性之佛教辞典中篇幅最大，引用资料最多，所列举之参考书目亦最为详尽，故颇为世界各国研究佛教者所重用。

^②《中华佛教百科全书》，由《中华佛教百科全书》编辑委员会编辑，台湾中华佛教百科全书基金会于一九九四年出版，蓝吉富主编。共十册。

卷略加弥补。南朝的书法文字，虽然涌现了王羲之等著名大家，然传世真迹也并不多见，甚至由此产生了兰亭是否为真迹的大讨论。然而，写经，因其追求整齐、美观、易于辨识、书写速度等原因，形成了特殊的「写经体」，与多有修饰的刻石文字一样，是不同于名家书法的书写体系。

当时的写经多为长卷，纵向书写，有界线分行，每行十多字至二十多字不等，至唐代逐渐形成定式，每行多为十七字。为慎重起见，卷后还列有相关人员的姓名。如唐代上元二年（六七五）的《金刚经》写本，其卷末即列有书写的年月日、写经者、装潢者、初校者、再校者、三校者、详阅之僧数名，及写经事业之监督官员。

写经的材料，在古印度和中国云南等地区，有使用贝叶的习惯，而汉语文献多使用纸张书写，特别情况下，也有素帛、金镞、槐皮、桦皮、竹帛、铜片、羊皮等，为了表示特别的虔诚，也有刺血书写的情况。书写之后往往又美化、装裱。望月信亨曾指出，「至于应用之物，如赤黄蓝缥绿紫黑苏芳胡桃桃金银等色纸，由木金银象久珀玛瑙赤玉青玉水晶等作成之卷轴，帙则有彩帙、织帙、竹帙、竹彩帙、竹缝帙、荻帙、谷皮帙等。经帙外又有经囊、经笥、经筒、经柜等，进而图种种彩画之色纸，以金泥、银泥交互书写之经文，可说极尽华美之工」。

虽然唐以后的佛经，流传至今的多为刻本，但抄本并未绝迹。然仍有人相信写经的功德，或者是念诵的需要，以至抄本写经仍然在广大乡村流行。就我们所收集的长江流域的相关遗物来看，书写的载体材质，除了纸张之外，还有羊皮、贝叶、铜片、大漆等；除了毛笔书写之外，还有经以刀代笔的刻写、漆书、金莫书写等；文字种类除了汉文之外，还有梵文、藏文、傣文等，基本涵括了传统佛经的主要类型。

四

抄写的佛经，流行了相当长的时间。当时的大部分佛经，也都是靠写本的形式流传的。直到晚唐，在九世纪时才出现了刻本佛经。著名的《金刚经》是存世最早的刻本佛典。该经现藏于大英博物馆，有「咸通九年（八六八）四月十五日，王蚺为二亲敬造普施」的题款，是现知有确切纪年的世界最早的木刻印刷的书籍。经卷卷首有一幅《释迦牟尼说法图》，刀法纯熟，线刻精美，是古典木刻版画的上乘之作，有很高的艺术水平。

自雕版印刷佛经兴盛以来，便出现了规模宏大的刊刻全套佛经的做法，或称一切经，或称大藏经。大藏经为佛教经典的总集，刊刻大藏经的，中国可考的至少有十八次之多（宋及辽金八次、元二次、明五次、清三次），此后还有石刻经藏（如著名的





「房山石经」)。与汉文经藏并列的，最重要的是「藏文大藏经」，不少宝贵的佛教文献仅存其中。

当今通行的大藏经，使用较多的主要有「中华大藏经」（以赵城金藏为基础，参校房山云居寺石经、资福藏、影宋碇砂藏、普宁藏、永乐南藏、径山藏、清藏、高丽藏等八种经藏）、日本的「大正新修大藏经」两种，它们都是以古代刻经为基础加以影印或排印的，也都利用了敦煌等地发现的抄本佛典经卷。古代刊刻的汉文经藏，著名的有：一、《开宝藏》。宋太祖开宝四年（九七一）敕令开雕，是我国雕刻大藏经之始。《开宝藏》以《开元释教录》目录为依据，是后代各种大藏经的基础。「赵城金藏」是开宝藏的复刻本。「高丽藏」也是以开宝藏为基础的。二、普宁藏。元朝至元六年（一二七八年）刻于杭州余杭县大普宁寺，收录佛经四三〇部，六〇一〇卷。三、洪武南藏。明太祖洪武五年（一三七二年）敕令在南京蒋山寺点校开刻大藏经，至洪武三十一年雕板圆满，历时22年。收经一六〇〇部，七〇〇〇余卷，分作六七八函。四、乾隆藏，或称龙藏。雍正十三年开雕，乾隆三年竣工。全藏七二四函。全部经版有七九〇三六块。其他重要的版本还有碇砂藏、嘉兴藏、辽藏、赵城金藏、元官版藏经、永乐北藏、永乐南藏、万历藏、卮字正藏、卮字续藏、高丽藏。

「藏文大藏经」所录佛典来源于梵文和汉文，因翻译成藏

文而得名。藏文佛典，在九世纪的《丹噶目录》之中，共有二〇个门类，约七〇〇种佛典。第一部藏文大藏经，雕刻于一三三三年。以后陆续出版了一种版本。藏文大藏经主要分为三部分：正藏（甘珠尔），包括经藏、律藏和密咒；副藏（丹珠尔），包括论藏和赞颂、经释、咒释；杂藏（松棚），主要是藏、蒙佛教徒的著作。最全的官刻藏经是一六八三年开雕的北京版，收集甘珠尔一〇五五部，丹珠尔三九六二部，松棚九四五部。藏文大藏经中关于密宗的论述比汉文大藏经要全，也有一部分源于梵文的佛典目前尚无汉译本。

这些有名的雕印大藏经，都是政府主持的浩大工程，校勘精、纸张好、装潢精，事前就有藏之名山传诸后世的想法。相对而言，普通寺院或民间雕印流通弘法的刻经，校勘未必精、纸张未必好、装潢未必精，但却具有很强的实用性。甚至部分刻经为了适应特定的需要，还有增损文字的情况，所刻经典也不全是佛经中的名著，有些甚至是佛经中的伪经。这些都是宗教民间化、日常化、生活化的客观需要，固然有唯心或迷信的成分，但总体上来说，比较贴近于传统儒道文化的本质，比较倾向于事亲尽孝、惩恶扬善等基本美德。

五

所谓「宝卷」，《佛光大辞典》征引《中国俗文学史》（郑

振铎著）、《宝卷の研究》（泽田瑞穗著）的意见，认为是「一种由唐代变文直接衍生之讲唱文学。约产生于宋元之际，而流行于明武宗正德年间（一五〇六至一五二一）至清末民初。宝卷之结构内容与变文大同小异，大多采用通俗易晓之语言，配合音乐，加以讲唱，以求通俗化。其所讲唱者，有以因果报应、佛道故事为主之佛教宝卷，亦有以民间故事、神道故事等为主之非佛教宝卷」。《中华佛教百科全书》认为，「盛行于明清民间宗教之间的讲唱文学作品，渊源于唐代的变文。其题材多为宗教故事，而以宣扬因果报应为主。明、清以后，取材于民间传说及其他社会生活内容的作品亦日益流行。曲本则以七言、十言的韵文为主，间杂以散文。又，由于宝卷经常被用作民间秘密宗教、秘密结社的组织工具，因而常被官方视为妖书、邪经而屡受禁压。保存至今者，约有二三百种。其中，有属于佛教及神道故事者，如《目莲宝卷》、《土地宝卷》等；有属于民间传说者，如《孟姜女宝卷》、《梁山泊宝卷》等；另有属于游戏性质者，如《药名宝卷》等」。

「宝卷」一词，是这一类书籍的总称，书名未必尽有「宝卷」二字，有单称「卷」、「经」者，亦有称为真经、科仪、宝忏、宝传者。《涌幢小品》卷三十二所载「妖书各目」八十八部中没有一本是以「宝卷」为题的，可见宝卷题为「宝卷」的做

法，应当在明朝正统年间之后。

相传「香山宝卷」是创作年代最早的宝卷（收入张希舜等主编《宝卷初集》第二六至二七册，山西人民出版社，1994年），是北宋杭州上天竺寺普明禅师，在崇宁二年（一一〇三）撰写完成的。宝卷本题「观世音菩萨本行经」，因源出于河南汝州香山寺，而别题「香山宝卷」。叙述证言观音菩萨乃妙庄王之三公主妙善修道而成。与当时流行女身菩萨造像相符，加之情节动人，在善男信女中广为传布，不胫而走，迅速在全国范围内传布。宝卷中谈到的观世音菩萨的出身，在大藏经中是没有记载的，因而，这主要是中国僧众自己的想象。这个故事，也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认可，成了观音信仰中的核心组成部分。元代赵孟頫的夫人管道升，在其撰写的《观音菩萨传略》中有云：「观音生西土，讳妙音，妙庄王之季女也。将笄，王以三女觅赘婿。长妙因，次妙缘顺旨，妙音以忤王被贬。后王病疮濒死，乃自幻形为老僧上奏：非至亲手眼不可疗。王以二女为至亲，宣取之，俱不用命。僧云：「香山仙长济度生灵，一启口必可得。」王使臣从仙长求，即自断剗其两手眼，付使臣持去。王服之而愈，往见仙长，果无手眼。吁叩天地，求为完之。于是叙父子之情，极欢。劝王修善，王从之。」除了故事情节委婉曲折之外，宣扬事亲至孝的思想也是显而易见的。另一个著名宝卷，叙论目莲救母，被





改编成戏剧、唱本，传诵极广，也是宣扬事亲尽孝的。另一种宝卷的标题，「怀胎生产孝顺忤逆报恩卷」，把孝道思想讲得更明白。

宝卷，固然以佛教为主，如《佛说销释保安宝卷》、《多罗妙法经》、《药师本愿功德宝卷》、《佛说三十五佛名经》等。也有佛教内容被极度民俗化、演义化了的，如《销释白衣观音菩萨送婴儿下生宝卷》等。但也有相当一部分，明显可以划入道教的范畴，如《灵应泰山娘娘宝卷》、《玄帝卷》、《吕祖师降谕遵信玉历抄传阎王经》、《八仙大上寿宝卷》、《吕祖宝卷》、《何仙姑宝卷》等，也有一部分恐怕是单纯的故事传说，如《销释孟姜忠烈贞节贤良宝卷》、《窦娥宝卷》、《琵琶宝卷》、《雷峰塔宝卷》、《方卿宝卷》、《珍珠塔宝卷》等（以上宝卷均收入张希舜《宝卷初集》）。约略而言，宝卷主要分为劝世经文与佛道故事两类，其主要内容以广为人知的佛道故事为主，也包括一部分宗教属性很淡弱的故事传奇。这类宝卷特别受民间善男信女的欢迎，《金瓶梅词话》中的吴月娘之流，便是宝卷的热心爱好者。

据郑振铎《中国俗文学史》的研究，宝卷之体例，以韵文为主，以散文为补充说明。通常每本分为二十四品，每品中又穿插下列四部分：（一）仪式部分，开头与结尾均须焚香迎请、恭送佛菩萨神灵，此时所唱之偈赞有开经偈、焚香赞、收经偈。（二）

说白部分，于每品之韵文前，以口语化之散文说白。（三）吟诵部分，为宝卷之常体，一般多用七言或十言之韵文吟诵之。（四）歌唱部分，以词牌或曲牌谱曲，加插于每品之中或每品之末。较常用者有驻云飞、黄莺儿、山坡羊、雁儿落、傍妆台等曲牌，或配以梆子腔、十字乱弹调，以便于诵唱。宝卷，毕竟是一种宗教文字，宣卷之时，必先焚香请佛，含有浓厚之宗教色彩，虽然兼有故事性和传唱性，但终究与一般的讲唱弹词有所不同，与一般的通俗小说话本也有所不同。

明清时代，民间宗教纷纷兴起，影响较大的有白莲教以及无为教、弘阳教、皇天教、龙天教、大乘教、罗教、闻香教等等。这些宗教各有自己的信徒，于是各教各派都有各自编造的宝卷，作为自己传授的典籍。宝卷往往被用作民间秘密传教、秘密结社之组织工具，各宗教以宝卷作为宣教传教的主要手段，他们将宝卷视为奉持经典，故而宝卷常被官方视为妖书、邪经，被禁压、烧毁，因而传世的数量不多。但也有一部分宝卷借助政治势力得以广泛流传，明朝太监张永，曾将无为教的《五部经》，进呈正德帝（朱厚照）御览。以至其宝卷由专司刊刻皇家书籍的经厂印行，颁行全国。无为教即刻昌盛起来，成为当时徒众最多的新兴宗教（周绍良《记明代新兴宗教的几本宝卷》）。

宝卷，有抄写的，也有印制的。印制的宝卷多粗糙，在当时

很少受重视。近人重视收集，已有一批成果问世，如王学斌《河西宝卷集粹》、李豫《山西介休宝卷说唱文学调查报告》、车锡伦《中国宝卷研究》、吉冈义丰《宝卷与民间宗教》等，集大成的当推濮文起《民间宝卷》、王泛森《俗文学丛刊》『说唱类宝卷』各若干册，是研究者赖以参考的重要资料。

六

在中国的佛、道两种宗教之中，佛教的影响始终大一些，而道教则与普通民众的心理更贴近一些。道教是在战国时代百家学派之一的道家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。在汉代已出现了最初的道教教团，至南北朝时期，彻底完成了从道家到道教的宗教化转变。道教，取『以善道教化』之意，奉持人格化的老子为教主，重生恶死，以追求神仙长生为基本取向（明朝道士张三丰认为道教『修身利人』，儒家『行道济时』，佛家『悟道觉世』）。道教的神祇谱系极为复杂，上至三清四御（元始天尊、灵宝天尊、先天天尊），下至城隍土地，无不罗列其中。大致说来，除了从古印度引进的佛陀菩萨之类，其他的各类神仙都可以归入道教神祇神系的范畴。道教的基本典籍是老子《道德经》、庄子《南华经》（《庄子》），围绕这两种典籍的注释解说，又发展出了数量繁多的子系著作，大都是阐释教理教义的。其他的典籍，主要

与道术和斋醮有关。道术，包括经法、忏法、斋、醮、符咒、禁咒、隐遁、驱邪、伏魔、降妖、消灾、祈禳、房中术、神仙术、辟谷、堪舆、占卜等。斋醮是斋与醮等两类道教仪式的合称，斋是清洁之意，醮为祈祷之意，通过这些仪式可以去灾求福。道教经典，首为老庄二系，次与道术以及斋醮相关，内容极为庞杂（儒佛之外，大抵可以归入道教）。

道经的编纂整理，虽然屡有模仿佛经之处，但毕竟与佛教有很大的不同。与佛教大藏经类似的道藏，自唐代开元以来屡有汇编，而被广为利用的首推《正统道藏》。明成祖即位之初（一四〇三年），曾令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重编《道藏》，永乐八年（一四一〇年），张宇初去世，又令第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继续主持编藏。到明英宗正统九年（一四四四年）始行刊版，又令道士邵以正督校，增所未备，于正统十年（一四四五年）校定付印。因成书于正统年间，故名《正统道藏》，共五千三百零五卷，四百八十函。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（一六〇七年），命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续补《道藏》一百八十卷，凡三十二函，名《万历续道藏》。合计共五千四百八十五卷，五百一十二函。这是我国现存的唯一官修道藏，今有影印本（涵芬楼影印本、文物出版社影印本、台湾艺文印书馆影印本、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本）。





道藏中的各种典籍，按三洞四辅十二类的分类方法编排：

洞真部、洞玄部、洞神部，合称『三洞』；太玄部、太平部、太清部、正一部，合称『四辅』；本文类、神符类、玉诀类、灵图类、谱录类、戒律类、威仪类、方法类、众术类、记传类、赞颂类、章表类，合称『十二类』。道藏的内容十分庞杂。其中有大批道教经典、论集、科戒、符图、法术、斋仪、赞颂、宫观山志、神仙谱录和道教人物传记等。此外还收入诸子百家著作，其中有些是道藏之外已经失传的古籍。虽然『正统道藏』因明英宗『正统年号』得名，但其所收典籍确实是道教的『正统内容』。其他有许多道藏不取的典籍，但并不影响它们在民间的广泛通行。我们现在收集整理的道书，固然有收入道藏的，但也有些是道藏不取的。相对而言，我们更重视道藏之外的典籍。我们此次刊行的长江中游地区民间写经宝卷中，就遴选了其中的一些本子，以期抛砖引玉，引起学界对此类文献的关注和重视。

图版与说明



经忏写本

征集地：湖南桑植

写本年代：清

封面题《城隍宝忏》

法玲瓏只待煙消滅盡沾塵下一點難
容楞嚴會香煙童子從此悟圓通香
雲蓋菩薩香煙童子從此悟圓通
彌勒尊佛彌勒尊佛彌勒尊佛彌勒
佛南無當來彌勒尊佛南無香雲
蓋菩薩摩訶莎

三稱

城隍寶懺

爐香乍爇法界蒙薰諸佛菩薩悉遙聞
隨意結祥雲誠意方殷諸佛現金身
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莎

三稱

天上天下無如佛 十方世界亦無比
世間所有我盡見 一切無如有佛者
南海普陀落伽山一座巍巍百寶百寶
孤峯孤峯入定碧波中碧波中現出水